

# 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sup>\*</sup>

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郭明 (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遗存都很丰富，主要堆积的范围大致相若；遗址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且在文化上传承延续。其为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区，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保留强烈的地方特色，并向周围辐射，形成一支分布范围甚广、影响很大的考古学文化。三星堆遗址是先秦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中心聚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为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是研究古文明演变的绝佳标本。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延续性；空间分布；古文明

这里正在召开的是“三星堆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纪念会”。其实，“祭祀坑”发现前后，四川也不乏重要发现，如羊子山土台<sup>[1]</sup>、新都战国大墓<sup>[2]</sup>等等，但其所有发现都无法和两个祭祀坑发现价值意义相比。因为祭祀坑的发现，对中国先秦考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致学术界多年探讨的“长江文明说”由此前少数学者的探讨，成为了今天的共识。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开创了四川考古的新时代。有专家说，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一系列发现的价值意义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我们认为这绝不是溢美之辞。不过既往对三星堆古文明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抽象而泛泛地说：一是说早期古蜀国不是子虚乌有；二是说长江也有古老的文明；三是说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等量齐观，甚至在多方面超过黄河文明，但均少进行具体的比

较。在纪念祭祀坑发现三十年之际，我们尝试以三星堆的新发现为基础，将其与全国同时期同级别的遗址比较，重新评估三星堆古文明在中国古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

本文所指的三星堆古文明是指以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及其所反映的物质文明。在三星堆近年的新发现尚未公布以前，大家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它包括了三星堆一期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三个文化阶段的依次堆积<sup>[3]</sup>。

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很多文章都爱进行量化分析，所以本文也主要是通过对一些数据的分析比较，最终落脚到三星堆文明的时长、空间分布、以及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三个维度。故采用了以上题目。

## 一 三星堆古文明的“长度”

这里的长度是指三星堆遗址的时间长度。对

<sup>\*</sup> 本文系第一作者于2016年7月18日在四川广汉召开的“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三星堆遗址延续时长的认识，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有个变化的过程。最早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发掘后，有学者认为其时代在周汉之间。上世纪七十年代妇好墓发掘后，四川学者根据对玉器的比较，认为时代可到商代晚期<sup>[4]</sup>。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礼器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年代参考，发掘者将时代上推到了商代中期，并在地层中发现新石器时期的堆积<sup>[5]</sup>，但堆积很零星，和二、三期不确定是否连续。1990年后，发现了夏商时期的面积达4平方公里的城址，以及新石器晚期墓地<sup>[6]</sup>。2000年以后大面积发现三星堆一期的地层堆积，三星堆一期遗存不但丰富而且分布范围约5平方公里<sup>[7]</sup>。

以上是往上延。从祭祀坑的时代往下延，就是大家说的三星堆四期文化。以前多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三期以后，三星堆遗址虽有堆积，但不成片、不丰富，在三星堆四期，文化中心已转到成都十二桥。而十二桥附近恰巧又发现了规模宏大、等级极高的金沙遗址<sup>[8]</sup>，这一推断看起来似乎更加合理。但我院十二五期间的勘探和试掘，特别是在遗址外围附近的发掘，证明在三星堆四期，三星堆遗址还是一片繁荣，城墙还在继续夯筑、修补和使用，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遗址内涵比三期还丰富，并未衰落，更看不出急遽衰落的迹象<sup>[9]</sup>。

由此，有几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第一，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堆积，一至四期都很丰富，主要堆积的范围也大致相若。第一期分布面积近四平方公里，比同时期的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宝墩遗址大得多，发掘的可复原的器物有2000余件<sup>[10]</sup>。根据C14测年数据，年代从最早的距今4800—2600年前<sup>[11]</sup>，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第二，一至四期的堆积在地层上是连续的，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

## 二 三星堆古文明的“宽度”

这里的宽度是指文化辐射所达到的最远距离。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区。关于这一点也有个认识过程。1960年

发掘的月亮湾，虽出有新石器晚期的遗存，但发掘者并不敢下定论。通过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发掘，才正式确认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继而，三星堆城墙的发现又引爆了成都平原古城群和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的大发现。今天所见的成都平原五千年前的桂圆桥文化可视为三星堆一期的源头。约当距今4800年前后的三星堆一期时，四川宜宾、汉源，贵州的赤水地区已有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发现，证明这些地区间是有联系的。鉴于在这广大区域内，三星堆遗址的中心聚落地位无可争议，有理由推断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三星堆的影响。夏、商、西周初时期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阶段。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力更为强大。东到三峡里的西陵峡，北至汉中、宝鸡，南有汉源、宜宾、土城、感驮岩，远到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如果把最远点连线成区域后，我们会发现这是个疆域和影响很大的帝国。与三星堆同期的郑州商城，面积相当，疆域广阔，为大家所熟知。从三星堆城的规模和出土物的精美及来源来看，有这么大个帝国再正常不过。

## 三 三星堆古文明的“高度”

这里的高度是指三星堆各期文化，尤其是二、三期所达到的文明高度。一期的新石器晚期，和全国大约同时期的中心聚落有良渚、石峁、陶寺、石家河古城等。虽然迄今为止，三星堆一期出土遗迹遗物的丰富性、精美度和种类上都远逊于以上其他在早期文明，但聚落的大小应该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出国力的大小。（见附表）。

简言之，红山、石峁、良渚、陶寺、石家河，其中面积最大的比三星堆遗址少100万平方米，就是说三星堆是同期最大的中心聚落（还没找到城墙，未必就没城墙，发掘者中也有认为已找到城墙）。关于上述几处中心聚落，很多学者将其视为所在区域文明起源的代表性遗址。在三十多年来文明起源时代大大提前的评估浪潮中，不少学者走得更远，认为以上遗址所处的时代已迈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自然的，三星堆遗址一



期也在文明起源的大遗址群中，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满天星斗中，西南地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三星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三期的文化堆积和面貌。一座约4平方公里的大城（和同期的郑州商城规模相当）、三个小城、大型夯土台（同期最大）和夯土台上两座面积约千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是南方同期单体建筑中面积最大的）、两个举世无双的祭祀坑。这一时期三星堆文明达到最高成就。以前，当祭祀坑发现时，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与其品级相当的城墙、城市、宫殿、城外的聚落、远播的影响，以及高级别的王陵、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经过三十年孜孜以求，到今天，除后两项外，其它各项考古发掘都有不同程度的斩获。总体来看，成果丰硕，远超预期。以祭祀坑来说，其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的数量、体量、造型艺术的成就，都是同时期最高的。黄金、海贝等遗物透露出的信息，又反映了其文化的独特性。综合来看，夏商时期，中原以外许多地方都受到中原的影响，也可以说生活在中原的阴影之下。唯有三星堆古文明，受影响之外，还顽强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在若干方面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在艺术造型、大型器物铸造、黄金的锻打利用等方面，甚至还超过中原。

三星堆四期，即西周阶段，前已指出，原以为文化中心移到成都金沙、十二桥一带。但十二五期间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城墙还在修补加固、遗址范围还在扩大、文化堆积仍然丰富，毫无衰退迹象。长江中下游同时期的遗址中，并没有那个遗址在规模、包含物上可以和三星堆相提并论。周初，周天子在东方分封了很多诸侯，他们或纹身披发、或筚路蓝缕，大多诸侯经营数代才过上稍微富足的生活。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直到西周晚期，没有一个诸侯的都城达到三星堆古城的规模。从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堆积及范围来看，说它是除周原、沔西外，同时代最大的遗址，恐怕大家也没有异议吧。

#### 四 结语

由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个三星堆遗址的发

掘，三星堆考古进入到后祭祀坑时代。祭祀坑的发现带给四川考古学者们自信，大胆地去寻找夏商时期的城墙进而寻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30年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考古发现，足以颠覆祭祀坑发现时人们对三星堆遗址、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认识。

从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地有成百的颇具规模的原始聚落，其中特大型聚落生产力的发达和生产关系的复杂程度，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他们即将或已经跨进国家文明阶段，三星堆也是其中之一。必须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众多的文明起源遗址中，三星堆遗址虽处于向文明迈进的遗址群的第一方阵，是长江上游、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中心聚落。但是在第一方阵的团队中，三星堆文明程度并不是最高的，也不是跑得最快的，与良渚、石峁、石家河等相比，三星堆的步伐要蹒跚些。她还有远离中原、僻居西南的地理上的不足，但上述那些向文明方向迈进的遗址，有一些可能进入了文明的门槛，另有一些则是昙花一现，像天空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见了踪迹。相比之下，三星堆虽然像个出生时不足月的婴儿，但他毕竟出生了——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跨进了青铜时代。

进入文明的少年青春期，也就是我们考古探讨的文明起源的诞生、发展期，中原地区有很多大型遗址，像王城岗<sup>[12]</sup>、二里头<sup>[13]</sup>、东下冯<sup>[14]</sup>，他们确实具备王者气象，但到今天为止，许多文章还在讨论他的主人和文化来源。而在三星堆原址上发展起来的三星堆古文明遗址第二期，是大家公认是早期古蜀文明的遗存。四千到三千年前后，除三星堆外，上述遗址均已衰落，原来生活在此的主人已不知所踪。新诞生的遗址，与前述遗址非但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且距文明起源地的大遗址的距离，近的都在一百公里外。三星堆的新石器晚期堆积上直接叠压夏时期的遗存，分布面积相若，文化面貌是直接承袭关系。到了商时期，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灭夏的商继承了夏，但文化传承的典型代表并不是在同一个遗址上演绎。二里头没

有商的像样的文化堆积，尸乡沟<sup>[15]</sup>、二里冈<sup>[16]</sup>、盘龙城<sup>[17]</sup>等遗址中也见不到跟二里头一样丰富的夏遗存。到商晚期，公认的商朝都城所在地殷墟遗址，也主要是商晚期的地层，即使有更早更晚的堆积，和商晚期堆积的规模、档次也相差甚远。而三星堆却二期（商早）、三期（商晚）直接叠压。文化面貌上，三星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发达程度虽不是并驾齐驱，但在某些方面，如文化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创造性上，却似远超商人。

西周王朝把都城建在关中的沔西<sup>[18]</sup>，被灭的商都即成为了废墟。同时期的三星堆古文明仍然坚守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遗址。

夏商西周时期，三星堆古文明处于第一文明发展方阵，在有些指标上还靠前。

从原始社会的解体、文明的孕育、诞生、发展、走向辉煌、到开始衰落，都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演进，这就是三星堆遗址。虽然她的文明发达程度整体来说并没达到中原夏商周的高度，但这个遗址延续了足足有二千年之长。这个现象为中国仅见，世界罕见。我们知道，探讨文明起源和演进的方式是人类要破解的世界五大五大谜团之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和研究，其价值意义更加不可估量。

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蜕变、文明起源、孕育、诞生、发展、辉煌、衰落的绝佳实物标本。从在一个遗址上集以上几者为

一身，人类古文明在一个遗址上长时间地演绎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唯一的标本。她还是中国唯一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城遗址。以上几点，即使放眼世界范围来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见的。

因此，对其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和保护仍然很重要。

注释：

- [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 [2]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6期。
- [3]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 [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 [7] 雷雨：《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对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的两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 [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 区“梅苑”

附表 三星堆遗址各期重要遗存表

遗址	分期	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	分布面积	重要遗存
三星堆	一	4800~4100BP	新石器时代晚期	5平方公里	青关山夯土台（面积超过500平方米）、大型柱洞式建筑（目前成都平原仅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有发现，但二者均无大型人工夯土台）、仁胜墓地（部分随葬玉器、象牙）
	二	4100~3600BP	二里头文化时期	3.5平方公里	月亮湾小城（西城墙北段、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月亮湾城墙，周长约3000米，面积约47万平方米），青关山人工土台，面积约1.6万平方米，月亮湾台地，仓包包祭祀坑（铜牌饰、铜瑗等）、月亮湾器物坑（玉石列璧）
	三	3600~3200BP	商	3.5平方公里	三星堆外城圈（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北城墙，周长约7000米，面积3平方公里），仓包包小城（北城墙东段、东城墙北段、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周长1400米，面积约9万平方米），青关山人工土台及F2
	四	3200~2600BP	西周	3.5平方公里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青关山土台及F1、F3，青关山H105、西城墙北段拐角四期补筑城墙，遗址外围较多同时期遗址（已经调查的鸭子河上游即有17处小型遗址）



- 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2》，科学出版社，2004 年。
-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15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会”介绍过相关发掘成果。
- [10] 同 [7]。
- [11] 有关三星堆遗址的年代问题可参考即将出版的《广汉三星堆——1980—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
- [12] a.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82 年；b.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 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 年。
- [1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 年。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科学出版社，2013 年。
- [1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 年。
-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1955-1957 年陕西长安县沔西乡考古发掘资料》，文物出版社，1962 年。

(上接第 78 页)

- 调查试掘报告》，《文物》1998 年第 12 期。
- [1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赵家河坝与上陈家碾遗址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11》，第 1~13 页，科学出版社，2013 年。
- [1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 2009~2010 年》，《成都考古发现 2009》。
- [19] 资料现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 a.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县宝墩遗址鼓墩子 2010 年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 2012》，科学出版社，2014 年；b.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2012 年新津宝墩遗址治龙桥地点发掘简报》，《考古》待刊。
- [2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 1998~1999 年度发掘收获》，《成都考古发现 1999》，科学出版社，2001 年。
- [2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郫县古城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3 期。
- [2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 年 6 月 3 日第 5 版。
- [24] 同 [23]。
- [25]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8 年度发掘工作简报》，《成都考古发现 1999》，科学出版社，2001 年。
- [2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002》，第 1~41 页，科学出版社，2004 年。
- [2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年度发掘纪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第 1~28 页。
- [2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遗址 1999 年度发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1999》，第 127~145 页。
- [2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 年第 10 期。